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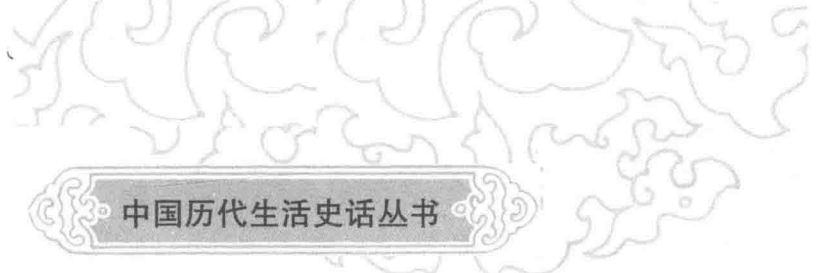
中国历代生活史话丛书

秦汉生活史话

王凯旋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历代生活史话丛书

秦汉生活史话

王凯旋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 沈阳 ·

© 王凯旋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汉生活史话 / 王凯旋著.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7.1

(中国历代生活史话丛书)

ISBN 978-7-5517-1437-2

I. ①秦… II. ①王… III. ①社会生活—历史—中国—秦汉时代 IV. ①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8717 号

出版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号巷 11 号

邮编: 110819

电话: 024-83687331 (市场部) 83680267 (社务部)

传真: 024-83680180 (市场部) 83687332 (社务部)

网址: <http://www.neupress.com>

E-mail: neuph@neupress.com

印刷者: 沈阳中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者: 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235mm

印 张: 17

字 数: 278 千字

出版时间: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文 韬

责任校对: 武 略

封面设计: 刘江旻

责任出版: 唐敏志

ISBN 978-7-5517-1437-2

定 价: 59.00 元

自序

屈指算来，自研习秦汉史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其间学习研读秦汉社会生活史大约也近二十年了，读书与写文章就成了学习古史的一项经常性的功课。读书之际便有更多的问题浮上脑际，手边的一支笔也便常常信手写来，将一些随感心得文字记录下来，几乎所读的各本书上都留下了数目不等的札记、评论和研读记忆。这期间促使我不断地思考，不断地研究问题，亦不断地修正与完善我个人的学术认识与学术观点。有关本书的结集写作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积累而成的。

我对秦汉社会生活史的学习是从一个个小问题入手的，这样做的结果便不至于流于空泛和虚妄，这是我个人治学的一贯认识。由此而在2009年写成了40个专题小文章，并由九州出版社于当年以《秦汉社会生活四十讲》为题出版。应当说，以这样的书题出版是并不科学严谨的，无奈当时的出版环境是我无法左右的，因而一直成为我本人修订此书的一个心结。此次以专题分类、章节论说的形式出版，是还原了书稿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对我本人研究心得的一个小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秦汉社会生

活史的研究范围十分广阔，笔者没有涉及的课题与子目还有不少，诸如秦汉时代的驿递问题、秦汉时代的灾荒问题、秦汉时代的学校教育问题，以及秦汉时代的环境保护问题，等等，都有待于研究、考察与论述。这也正是本人称此书为《秦汉生活史话》而不敢遽称之为《秦汉社会生活史》的原因所在。无论如何，以研究书稿的方式付梓出版，对我而言仍是值得欣慰的，它也将促使我今后不断地增补、修订、完善我所从事的这项研究和著述。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本书中多处参考并大量引用了许多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林剑鸣等先生所著《秦汉社会文明》，孙机先生所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杨树达先生所著《汉代婚丧礼俗考》，乔伟先生所著《秦汉律研究》，熊铁基先生所著《汉唐文化史》，余华青先生所著《中国宦官制度史》，完颜绍元先生所著《流氓的变迁》等。书中图片资料主要来源于孙机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刘志远先生的《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查瑞珍先生的《战国秦汉考古》，彭卫、杨振红先生的《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等书。

感谢读者朋友们多年来给予我的支持、鼓励与研讨。我由衷地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一如既往地关心、从事这项研究的朋友们携手前行，以期早日完成秦汉社会生活史的撰述工作。由衷感谢东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郭爱民先生认真审阅并校订书稿。是为序。

王凯旋

2016年初春于沈阳

目 录

第一章 秦汉时代的政治生活

- 第一节 秦汉士人与士风 / 2
- 第二节 秦汉的博士官 / 11
- 第三节 秦汉时代的宦官 / 15
- 第四节 秦汉惩治官吏的法律 / 20
- 第五节 秦汉刑罚与刑徒 / 27
- 第六节 汉代的酷吏 / 35
- 第七节 汉代的流氓 / 42
- 第八节 汉代选举制度 / 46

第二章 两汉时代的经济生活

- 第一节 两汉农耕生活 / 54
- 第二节 两汉渔猎生活 / 63
- 第三节 汉代市井生活 / 68
- 第四节 汉代养马和相马 / 75
- 第五节 汉代的货币 / 80

第六节 汉代制盐业 / 88

第七节 汉代的官商 / 92

第三章 秦汉时代的文化生活

第一节 秦汉谣谚与世风 / 99

第二节 汉代书籍与文具品 / 109

第三节 汉代人的审美观 / 121

第四节 汉代地图概说 / 126

第五节 汉代兵器杂说 / 130

第四章 秦汉时代的城乡生活

第一节 秦汉时代的城市 / 138

第二节 秦汉时代的边塞 / 147

第三节 秦汉交通与交通工具 / 150

第四节 汉代医药和医学 / 169

第五节 汉代船与造船业 / 173

第五章 秦汉时代的世俗生活

第一节 汉代婚姻法与婚俗及胎儿教育 / 178

第二节 汉代饮食与酒 / 193

第三节 汉代日用杂品与灯具 / 209

第四节 汉代娱乐与杂技 / 217

第五节 汉代住宅与家具家庭装饰 / 231

第六节 汉代丧葬礼俗 / 247

第七节 汉代服饰与女子梳妆和化妆品 / 254

第一章
秦汉时代的政治生活



第一节 秦汉士人与士风

士人，即通常所说的读书人，是秦汉时代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人员素质相对较高，文化底蕴也比较深厚，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所出现的问题既关注又十分敏锐，并在社会上以立言立说阐述和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秦汉间的这一批士子文人在他们自己的精神领域和内心世界极富个性化，他们或在朝，或在野；或讲学游宦，或落拓不羁。他们的言行和思想意识对秦汉时代的政风、民风都有深刻的影响。秦汉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

秦汉时代的这一批读书人在个人性格特征、情感思维、身世经历、道德追求、生活理念、待人处事，以及所持学术观点、为政信仰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士人忧国忧民的心理特征则是普遍共有的。秦汉士人很少将自己关锁在书斋文札中，他们把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诗文著述看作社会的学术和政治的学术，因而在秦汉流传下来的许多文献里很少有宋儒那样嗜谈性理的言辞，即便像《史记·天官书》那样的纯天文学著作也无不涉及社会政治的内容。

因此，秦汉士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评说世事，纳言献策。其学术目的之明确，论世事之尖锐，参与政治之热情为中国历代所少见。正因为如此，士风在秦汉两代的影响也就非常广泛而深刻。

一、秦代的士风

秦代是中国统一专制王朝的开始，从秦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是皇帝家天下的时代。皇帝一人说了算，政权专制垄断了一切，士人在其间的作用是以维系专制皇权的需要来衡量的。

秦政权用“五德终始说”中的水德作为立政的根本。水德主刑杀，因此崇尚先秦以来的法家思想，以严刑峻法贯彻其政治统治，所以士人中法家一派的李斯便得到了秦始皇的欣赏。当然，李斯主张法家治秦也并不是秦朝建立以后的事，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时期就已经如此，李斯也

因此由士学之路踏上了仕宦之途。李斯在秦统一后曾做了一件对中国历史来说是大大的好事，这就是他在同群臣的辩难中坚持实行郡县制，反对分裂割据的分封制，并为此后实行的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项措施出了力、立了功。但他为维护皇权，抑或说他慑于皇权的淫威，由一个读书人回过头来残灭文化，尽焚诸子百家之书，最终也没能逃脱专制王朝政治斗争殉葬品的命运。在秦末的政治角逐中，李斯为谋求一己之私利并保全政治荣耀，俯首低眉于邪恶的宦官赵高，但最终还是赵高要了他的命。这是作为丞相李斯的悲哀，更是作为士人李斯的悲哀，一个软骨士人应有的悲哀。

秦代有相当一些知识分子为求生存之路和显达地位而屈身于皇权门下，对皇权的代表者皇帝本人极尽谄媚阿谀之能事。秦朝建立不久，就有几十名博士联手像啦啦队一样在宫中颂秦始皇的“功德”，其过谀之甚，读者一阅便知。他们明知在助纣为虐，却不愿人们把它说出来。政治士人的心态之诡、情感之复杂，正是秦代士风一个方面的反映。

虽然如此，但是秦代的读书人并不尽如李斯的为人。秦代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不愿或拒绝为当朝出力。他们隐姓埋名，寄居乡野，游学



◆ 秦汉士人图

秦汉士人是一个知识群体，汉代选官的主要来源即出于此。其中，秦汉两代的博士官构成了朝内士人的重要代表

论世，诗文言志。一个客观的结果就是尽量不使自己的踪迹被秦政权的鹰犬们发觉，三世相韩的张良即是这样的士人。秦代的这一批智士学人并非不愿参与政治，但“良禽择木而栖”的理念以及能够代表和反映他们学说意愿的政治领袖的出现，是决定他们出仕的前提条件。秦代的两个皇帝都不是这样的人选，因此秦代士风中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的沉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大批士人远离政府而退隐于民间，秦代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在朝任职的博士官们也只是充作政权装饰的门面以及备作皇帝典章文赋的顾问，如此而已。从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关秦代的各类文献中都鲜见士人的身影。秦代的士人在民间，秦代士风的源头也在民间。秦代专制独裁的政治统治，使得许多身怀硕学的士人远离秦政权而深藏于民间或乡野。“士为知己者死”曾是先秦士人的一条名训，但这样的名训在秦代的政权中却再也难见。

秦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人视暴政为仇敌，此前所说三世相韩的张良就曾计划在秦始皇出巡的路上截击他并“椎杀之”；秦皇帝东巡即遇“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书；甚至也有人以求长生之名套走了秦始皇的大批钱财，尔后又对秦皇帝大骂一通扬长而去；更有众多的士人公开或私下里以言谈文章等形式反对秦政权的残虐无道。秦始皇为此而恼羞成怒，《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犯禁的四百六十多人正是秦朝的文人学士。为什么非要置这些士人于死地呢？因为这些士人攻击政府，攻击专制残暴。杀这些人是给更多的士人一个信号，同时也是一个警告——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由此可见，秦代士风中反专制残暴的色彩十分浓烈，即便在“焚书坑儒”以后极其恐怖的时代，士人也依然没有停止这种反抗斗争，所以秦代的先后两位皇帝对士人十分痛恨。学术历来是师承授业，秦政权否定了弟子求学于士人的客观法则，强制学子们“以吏为师”，用一种强盗的逻辑替代学术的规律，其政治的荒谬愚蠢达于极点。它突出反映了秦专制政权对士人上学的恐惧。汉代学者伏生当年曾在家中墙壁内藏有被禁毁的《尚书》，说明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还是敢于冒杀头的风险来保存文化火种的。而且像伏生一类的士人，当也不在少数，否则就无法解释当西汉惠帝“除挟书律”后，会有那么多的先秦文化典籍能够在民间重现这样一个事实。

秦代士人在等待时机，这样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这就是以陈胜、吴

广为代表的反秦农民起义。

值得注意的是，秦末各路反秦义军中，都有为数不少的士人出现。这种一夜之间士人突现的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内中深刻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士人慕名投军，参佐军务，枢办行政，积极地为新政权出谋划策，摇旗呐喊，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士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特别是作为一个智士集团，已成为覆亡秦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这些士人中有许多是来自于六国旧贵族的后裔，每个人的主观动机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各有不同，但士人与反秦义军的携手，却无疑是建立在推翻暴政的共同基础之上的。秦在立国后曾力克山东六国，其时士人云集，游说东方，张仪、范雎之属皆为秦所用，势力之大、锋芒之锐，无人无国可挡。但在秦朝建立的十五年后就急转直下，表明秦政权昔日的活力已不再现。贾谊在总结秦朝败亡时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汉〕贾谊《过秦论·上篇》）秦政权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作为政权建设基础的知识分子的支持。

秦代士风在秦朝的腥风血雨中始终昂扬着正义和进取的雄姿。它不同于商业时代的文人群体，中国传统的儒家风范和人格理念是秦代大多数士人的最高追求目标，名利观念也由此被大部分读书人视为浮云。这种文化精神和价值的存在就决定了秦代士风的社会走向。贾谊在《过秦论·中篇》中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

反抗暴政是秦代士风始终



◆ 秦之罘刻石

此图为秦始皇东巡芝罘所刻文字，内容多为颂扬秦始皇之功德

唱响的一个主旋律，由此而深刻地影响了秦代的政风和世风。摧残文化、侮辱士人的统治者从来不可能久坐天下，秦朝败亡的事实足以成为历史的鉴戒。正如贾谊所说：“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汉〕贾谊《过秦论·下篇》）

二、汉代的士风

汉代，包括了西汉和东汉两个王朝阶段。从整个汉代历史来考察，士风变化巨大，呈现出多样的特点。与秦代不同的是，士人在汉代参与政治的热情比较高，分属于各学派的士人利用不同的场合和渠道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和对社会时事的关心。伴随两汉外戚、宦官、党人、太学生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士人群体也充分地参与其间，在社会政风、民风、世风等许多方面都处处表征着汉代士风的影响，士风也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发生着深刻而微妙的变化。汉代士风的政治民主色彩也愈显浓重，对汉末政治腐败的抨击表明，汉代的士人阶层忧患意识强烈。汉代士人的忠君思想比较浓厚，它成为汉代士风维护皇权的一个很重的砝码。随着汉代社会商业意识的高涨，汉代士风的吹拂也散发出商业市场的气息。因此，就汉代的士人和士风而言，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时代和社会变化的精神意识。

汉代士人参与政治的活动贯穿于汉代存亡的始终。汉代的皇帝比起秦代的皇帝来也比较尊重当世的士人。刘邦原为一介村夫，但他在建立汉帝国后，还是懂得知识分子在政权建设上的作用的，所以他起用学人叔孙通来制定礼法。汉高祖对士人的礼遇固然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为士人参与政治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在西汉初年的中央政权里，士人的比例明显地高于秦朝，如张良、陈平、陆贾、贾谊、酈食其等人都是饱学之士。西汉初年，许多大政方针的制定都离不开士人的积极和努力。刘邦之后的惠帝颁布“除挟书之律”，事实上等于否定了秦朝的焚书之举。文、景两皇帝和汉武帝也在尊崇士人的同时，进一步开放了学术空间，儒、道、墨、法各家学说又相继兴起。在汉代，基本的

学术倾向还是儒道并行，虽然武帝时“独尊儒术”，但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强力限制各派学术的自由发展，更没有采取极端的恐怖手段。立于政府学官的儒学是汉代所倡导的“国学”，没有立于学官的各家私学还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学术保留并传播的。所以汉代士人中的私人讲学之风很盛，门徒弟子也很多，特别在汉代地方藩王和豪强地主接纳士人充当谋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私学的发展实际上是很快的。

《西京杂记》记载：“河间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河间王礼贤士人，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生活标准不能超过宾客士人。可见，汉代已大有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由此使士人为报知遇之恩而投身于政治和社会活动，士人也就不再沉寂了。

汉代前七十年的历史中，官私之学都比较活跃，与秦代“以吏为师”的法家一学相比，其学术氛围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西汉前期的士风就表现为积极进取的学术意识和士人参政议政的主动精神。从西汉的相关史料考察，汉代士风的这一特点基本是一以贯之的。

西汉初年相继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代表，如：长沙王太傅贾谊、太史令司马迁、博士官董仲舒等。他们针砭时弊，言辞尖锐，对汉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问题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论阐述。汉代的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发展比较有利，除东汉后期宦官干政，排斥异己，剿杀士人外，各代皇帝从总的情形来看，对学术、学派的活动并不横加阻挠。

正因如此，两汉时期学人辈出，如：刘向、刘歆父子，张衡，司马相如，东方朔，匡衡，贡禹，蔡邕、蔡文姬父女等。《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了东汉一朝著名的儒林学士就达24人，这也是仅就充任政府学官的人来说的。大量的在野或于民间游学之人以及后学传习者尚不在列传之中。众多学人的出现是汉代文化繁荣的基石和保证。

西汉时期的学人大多具有为民请命的精神意识，在有关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关乎汉代民人经济政策的制定、商讨、确立和实施的各个阶段，汉代学人都以高度的忧患意识上书直言，痛陈时弊，使这一时期的基本政策大致保持在比较有利于民人的水平上。这一时期的士风也呈现出比较健康向上的势头。西汉年间，在反对地方封国割据、揭露酷吏贪财虐民之事，以及抨击豪强地主侵吞民人土地和官吏违法揽赃等许多方

面，汉代士人中的许多人都直言敢谏，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优秀的气节观和正义品质。

汉代宽松的学术环境使这一时期的士风呈现出各派各家学说纷呈的特点。西汉初年，代表道家一派的黄老学说兴起，这种社会思潮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清静无为的治政方针。汉代学术的恢复大约也是从这时开始步入一个相对平和的时期。士人此时的言论明显增多，其个性化也比较突出。如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晁错的《论积贮疏》等，其锋芒直指朝政流弊。两人的结局似乎都不大好，但这不是汉初士风的命运所在，而是其中深刻的政治原因所致。就单纯的学术问题而言，汉朝政府并不强制树一派而压一派。汉代文献中屡屡出现的官吏士人上书言事和谏诤抗命之辞的多次出现，说明汉代还是一个允许士人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相对自由发展的比较好的时代。像东汉末年的黄巾领袖张角最初组织太平道，汉政府并没有太多地放在心上。直到张角公开打出反抗东汉政府的旗帜以后，才引起了当权者的恐慌并受到镇压。当然，张角与汉政府的对立不是学术观点和学术争论的问题，而是农民革命要推翻地主阶级专制腐朽政权的问题。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我所要说的是在汉代皇权政治的社会条件下，形成汉代士风的那些客观存在的因素和条件，正是汉代社会在总的历史背景下的这种氛围和条件，使汉代士风从一开始就展现出许多不同于前代的独有特点和理念倾向。

汉代士人在生活理念上恪守并坚持奉行着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孟子》一书在阐述儒家理想的道德人格时说，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汉代士人以此为宗旨，他们的气节观和行为规范都体现为一种平实求真、豁达人生、绘画千年并与自然一体的完美境界。这是汉代士人最高的人生追求，也是汉代士人立足于世的精神支柱。汉代士人对气节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又不是抽象虚幻的，而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随时都可以触及的真实精神，这就是对正义、信念、道德、情操、自尊、自重、自强、自爱、刚毅、果敢等精神品质的物质再现。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序中说：“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不独汉代的侠义之士如此，文人学士亦如此。贾谊在西汉初年三上《治安策》，不避刘氏宗亲的诸多忌恨，是冒了极大政治风险的。因为对封国和刘氏宗亲的任何一点攻击性言论，都可被视为是对刘姓王朝的攻击，是离间皇权血缘骨肉的行为，是要遭重谴或杀头的。他的直言极谏使他远离了京师，也使他从此落落寡合于众人之外。但贾谊的内心并不曾软弱，他是忧郁而死，但他独立的人格精神并没有死。汉代士人在政途上的不得志并没有磨蚀掉他们内心气节的一丝一毫。西汉前期至中期士风中的主流即是如此。

汉武帝以后，由于谶纬神学的兴起，士风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一些士人为求得自己的仕进之路，迎合阿谀当权者的神权心理。《汉书·王莽传》记载：“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匱，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匱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像哀章这样的学问者，无非是为求得王莽的欢心，以便在日后的从政生涯中捞个一官半职，其猥琐的心态昭然若揭。到了东汉时期，汉光武帝极力张扬图谶。汉代政府对治学的宗旨也是“博贯五经，兼明图谶”，汉代士人中的许多人也在这种神权加皇权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漂泊着自己的学术和人生。正如顾颉刚先生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所说：“图谶本已迎合人们迷信的心理，现在又定为功令的必读书，当然钻入各个角落更深更普遍了。”

汉代，特别是东汉各种祭祀的增多和烦琐无疑是受了谶纬的影响，汉代士人对于经学的热衷导致了对现实研究的冷漠。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汉代士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头脑还是清醒的。汉代学人桓谭说：“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使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贫邪，诳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后汉书·桓谭传》）这种“浅儒”，也正是鼓吹或附庸谶纬的汉代的一班士人；桓谭对他们谬说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汉代士人中如郑兴、尹敏、张衡等人，都是拒绝谶纬的勇士，他们勇就勇在能在谶纬的汹涌波涛中奋力抗

争。汉代士风在东汉晚期形成了一个进取的高潮，这就是面对宦官邪恶势力垄断朝政、滥杀无辜、贪黩害民的罪恶行径所展示的凛然气节。东汉末年的“党人”中，很大一部分人就是士人出身。他们或以察举任职，或以贤良辟官，或以才学高就，其忧患意识也在此时达到了巅峰。重名节、重信义成为汉代士人这一时期推崇的人生哲学和价值理念。因此在同宦官的斗争中就不惜“杀身成仁”、徒手搏刀。士人也以著书立说、讲论谈说的形式为党人张目，公开指斥宦官的罪恶。《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东汉晚期士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士人之间、士人与党人之间、士人与民众之间在反对宦官专权暴政方面的空前团结一致和士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槩，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李膺是读书人出身，但李膺做官后并没有丢掉读书人的本色。东汉后期的许多官僚仰慕同情并支持士人的许多举动，还是更多地看重了士人同宦官斗争的意志气节。所以东汉末年的士风已然成为社会的世风。在这场斗争中，东汉太学参加的人员一次即达三万余人，政府培养的这一批学人可谓倾巢出动。可见，士人在东汉末年同宦官的生死斗争中已形成了强有力的联合。士人以其敏锐的思想意识和崇尚名节的行为表明了他们的真实心迹。《后汉书·党锢列传》在讲述李膺被宦官陷害免官回乡时说：“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士人丝毫不把皇帝老子放在眼里，而是痛加责骂，正是说明汉代士人对人生目标的追求不是朝廷的威权所能左右的。直到宦官集团覆亡，汉代士人的斗争也从未停止。

汉代士风的发展变化始终围绕着士人理念中的讲德重义以及激扬名节的精神追求来展开。汉民谣中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因此，汉代士人常常以这种价值精神激励自我、砥砺人生，而不屑于去向邪恶势力低头。尽管汉代士人的言行各异、面貌不同，但汉代士风的主流仍是自然而真实的。唯其如此，也才会升华出汉代灿烂的文化。